



大夏书系·教师专业发展

救忘录

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

陈日亮 著



上海市
重点书局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大夏书系·教师专业发展

救忘录

——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

陈日亮 著

各种修饰与限定如生命、讨论、优雅、智慧、情趣、魅力等，无不论调语文课应该具备或突出这些元素。而武汉的史伯英先生则直呼：语文就是语文。

今年二月六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刘文嘉的一篇文字，题目是“找回朴素的平常心”。其中有云：“这两天，~~强心槽~~过节的祝福又被频繁转发。祝福中那‘过场’般过节的概无抬一抬，连冻水饺、穿淘宝新衣、钱包发红包、群发短信大拜年，更要相8次亲”，让人不胜唏嘘也颇有同感。

我因这段话而突发联想，语文味的消失岂如平时心对应入座。备课与教学冻制的教参，或者点在网上随便淘取改成资料，作业合作又仅用统一评语，堂议虚话，师生“评上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救忘录: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/陈日亮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5675 - 1687 - 8

I. ①救... II. ①陈...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0063号

大夏书系·教师专业发展

救忘录

——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

著 者 陈日亮
策划编辑 朱永通
审读编辑 朱 颖
封面设计 吴元瑛
责任印制 殷艳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开
插 页 1
印 张 15.5
字 数 236千字
版 次 2014年9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年9月第一次
印 数 6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1687-8/G·7164
定 价 35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如今我国家民族，大概还不至于有救亡的问题，而自己呢，却活到了“救忘”的危急关头！以每日平均读五千言计，读过之后，忘掉的简直也就是这个数。我几乎是天天读天天忘，这样每一天就都白过了，怎能不哀叹。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于是开始着手个人的“救忘运动”：凡有所读，多少觉得该留些记忆的，便赶紧摘到本子上，不计所读者深而所感者浅，多半会或长或短写上几句，有的则是一时兴感，与所读并无关联，庶几挽住所读的印象和零碎的感想；自省亦颇能践履古人所主张的眼到、心到、笔到，和所提醒的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”，于自家心田随撒随播，问耕不问获，乐在其中矣。如此积以时日，便有了大约十来万字的五本小册子，稍觉没有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之憾了。

这些零碎抄录和随意书写，始于何时，已经记不起来了。有闲就读，偶得辄录，文字犹如鸿爪，时间失去意义。由于内容极其琐杂，编辑时一点不想归类，也根本无类可归，只按照笔记的顺序，大凡一本归为一辑，随取第一段文字的首个词语，仿古作“××章句”，老实承认编辑乏术，聊以塞责耳。

如今的出版物五花八门。出版社认为此类私货也有印行价值，他们道理十足，我也不坚持。如果买了它的读者，偶尔随手翻翻，发现一则两则还有点意思，也不枉出版人的善意了。当然，要是有人翻了之后，发现只合放在洗手间的某个位置，与取用手纸一样方便，我也绝不反感；因为读书于“三上”，本是一句古训，比它高贵不啻千万倍的书，人们都经常往那里面带，我这又算个什么东西呢？

鲁迅说过：“删夷枝叶的人，决定得不到花果。”我不在乎花果，但每天多少总要舒展些枝叶——它们是我生命存在的见证。

我已经出版过的两本书《我即语文》和《如是我读》，都带着一个“我”字。

这回考虑书名的时候，曾想用“俯仰我斋”四个字，表明是在自己的书房——俯仰斋——里作成的：狭小而孤陋。但是编辑先生却认为这名字虽颇雅致，也许只有几个韵人雅士才会去翻翻，放在网上或店里，问津的一定不会多。于是又复考虑了其他几个带“我”的书名，皆不妥切，最后彻底“回归本然”，便是这“救忘录”三字，倒也完全符合实情。

但是到了收到书稿清样的时候，编辑给的书的副题里却出现了“特级”二字，竟使我好几天晚上推迟了合眼，早晨提前了醒觉：我发现这两个字很是不妥，大有自炫的味道，好像只有特级教师才能如此读写，标榜之意跃如也。可是更换已经太迟，而且不管怎么说，从出版方看来“特级”二字还是有点诱惑力的。果真如此吗？我一向是很怀疑的。当今标上“特级饮料”、“特级酱油”、“特级米粉”之类的商品比比皆是，试问顾客多乎哉？最后想想，到底睡眠质量要紧，也只好从俗随宜了。

我每天的随读散写，是一个自我生命的流程，除非哪一天停止呼吸和无法动作，大概总能持续下去吧。不过我也十分清醒，这绝对是一堆速朽的文字，犹如每天地上杂遛的脚印，不多久就会磨灭。让私人的书写，成为大众所窥的东西，非我本意。我的愿望，如同我在《如是我读》自序里说过的，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因此而喜欢阅读喜欢思考，并留下痕迹，如此而已。过分袒露，无异招摇，实所不取。

我写字有时很认真，有时又很随便。从写得不无潦草又挤挤挨挨的小本笔记里，逐一辨认再输入电脑，变成工整可识的文本，为了这件事，我要特别感谢福州一中图书馆的李文华老师，还有我的女儿陈都，她们俩都为我付出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。要不然，让我自己敲起键盘，大有可能终因艰难畏怯而废然中止。这样一来，究竟是该感觉遗憾还是值得庆幸呢？我实在也说不清。

二〇一四年芒种季节 于俯仰斋

目 录

前言 [1]

一、“多年”章句 [1] 二、“不久”章句 [47]

三、“当今”章句 [91] 四、“某日”章句 [135]

五、“最近”章句 [179]

代后记 [239]

一、“多年”章句

多年来记性大衰，所读易忘，有极精彩要妙语句，倏忽失忆，遂大懊恼。昔人有一笑话云：“一人向众夸说，我见一首虎诗，做得极好极妙，止得四句诗，便描写已尽。旁人请问，其人曰，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，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，旁人又曰，既是上二句忘了，可说下二句罢。其人仰头想了又想，乃曰，第三句其实忘了，还亏了第四句记得明白，是很的很的意思。”

余亦每向人称道所读书句，到嘴边则往往“甚的甚的”，幸旁人并不继续“请问”，瞬即躲过，否则亦大可入今之《笑得好》。故读书忌忘，最好是笔记摘录，否则当远远避人称道和夸说，免增自惭耳。

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，徐特立就说过：学国文的主目的是语言文字（文章）的理会与发表。副目的才是从语言文字（文章）获取知识，涵养德行，养成好的情趣。

这话说得明确。评论者认为这才是第一次在语文教育史上确立语言本位的教育思想，在权重上使语言文字超过义理成为教学的主要目的。但有人会认为主与副要颠倒过来；也有人认为二者既然是统一的，就不要分主与副。我认为徐特立将目的与功用区分开来，着眼的是学校学科教育的任务。

昆德拉在《笑忘录》里说：“我们写书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们根本就不屑一顾。”

为他人之不屑一顾而书写，这的确是一个很充足的理由。

清袁枚《续诗品·尚识》：“学如弓弩，才如箭镞。识以领之，方能中鹄。善学邯郸，莫失故步。善求仙方，不为药误。我有禅灯，独照独知。不取亦取，虽师勿师。”

刘知几谓治史当具才、学、识。三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，颇难说清楚。袁枚此诗通

过比方，却通俗地说明白了。当然仍需详为解说，比如同是实物的弓弩与箭镞，其本体可否互换？此题若作为语文作业，想必很有思维训练价值。至于诗中表达如何学习他人的经验，意见也十分中肯，尤其是最后两句，可供学生加以议论发挥。

当年，亚历山大大帝向第欧根尼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可以为你效劳？”

正在破木桶里睡懒觉的第欧根尼，睁开双眼，见王站在面前，说道：“有。就是站开点，别挡住我的阳光。”——这句话，被称为西方人权概念的第一块基石。

在中国的历史（哪怕是传说）里，我们是否也能找到如此蔑视王权的经典话语？好像没有，即使有，也搁在肚里，谓之腹诽吧。透露一点，旋遭屠戮，例如嵇康。

古人有句云：“闭门即是深山，读书随处净土。”此的确最适合读书人心境。如果放在当今，俗世之山会不时排闥入门，闭门谈何容易！书市之伪品劣品，满坑满谷，读书净土亦于何处求得？然而更常见的，是读书人总喜欢或习惯于开门，热衷于发博。他们的心理本就少了干净，这又如何能转向外求？

今世的书法界很热闹，却鲜能看到几幅成熟耐看的作品，追逐形式新异的变态笔墨与章法，冒以创新之名以欺世，而又相互仿效、彼此吹捧且四处叫卖，已然成为时尚，而缺失的是艺术文化求真的品质。有人说过，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，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、随顺、诚恳；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，美则美矣，却未免失去了整体的社会性诚恳。据说，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，曾对秦观说：“书，心画也，作意则不妙耳。故喜求儿童字，观其纯气。”

一个“纯”，一个“诚”，求之于今之书画界，戛戛乎其难哉！而所谓“美则美矣”的“美”，亦大多是欺世媚俗耳。

朱以撒主张书法艺术要“行于简易闲澹之中”。此见解极是。不过，繁缛之至方可求之简易，绚烂之极乃能归于平淡，都是接近炉火纯青的境界，非一般书法作者所可强求。当世竟有以随便与松弛，强做不衫不履之姿态者，熟视之则大有乞食气耳。

颜真卿的书法一向得到的都是好评，认为跟他的性格人品高度一致而备受世人钦仰。可是李后主却对颜字偏不喜欢，说是“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”。又讥为“有楷法而

无佳处，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”。

颜真卿是一军人，膂力过人。笔墨“粗鲁”可能与之有关，但说是犹如田舍汉，则可能是这位文人天子的审美偏见。正确评价颜体书法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四个字：平正端肃。我看许多初学书法者多从颜体入门，即取其端正为正路，至于气魄雄浑之类，几乎没有一点半滴肖似的，反见其无骨力而徒留臃肿，以其未有人生历练故也。

黄永玉如是说：

1. 不爱人，不爱周围的生活，不爱读书，你怎么画画呢？
 2. 小人与巨匠的区别是，遇到难堪，小人终生叫嚷，巨匠早已超越。
 3. 美，比好看好；好，比美更好。
 4. 欣赏水平如喝茶，开始时喜欢加糖。
- 1、2 两句，于创作者是忠言；3、4 两点，对鉴赏者是启蒙。

常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十分缺少一种善意的批评和宽容的接纳，彼此构成良性互动的精神系统。我不知道西方人际环境究竟如何，而单看在学术方面自由宽松的放言和质疑，发现他们的说者与所说者，都很独立而有自信，而我们则异乎是。

柏杨说：“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，什么都受得了，就是受不了批评，一旦被批评，立刻血海深仇。”悲乎！

龙应台认为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“坏人”，因为中国人怕事、自私，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，他宁可闭着眼假寐。

这是不是跟教育也有关系？

龙应台也曾指出台湾封闭教育的弊端，是在生活上“抱着走”，在课业上“赶着走”，在思想训练上“骑着走”，牺牲学生自立自决、自治自律的能力。

为什么大陆与台湾有如此相似之处？我们的意识形态不是截然不同吗？是不是在教育文化基因方面，两岸也同一脐带，是同祖同根同源？

美国政治家格雷说过：“一个不能通晓伟大作家的伟大著作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惭愧自己最了不起的想法或观念，不过是那些作家的牙慧而已。”

我想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那“总有一天”。因为既然“不能通晓”，也就无从发现，

就不可能“会惭愧”。所以世上自以为最了不起的人，包括他们的信众，才会有那么多。

一个人在自己经营的文化空间里，能够收获多少快乐，而且是怎样的一种快乐？且看李清照的一段叙述——

“余性偶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，以中否角胜负，为饮茶先后。中即举杯大笑，至茶倾覆怀中，反不得饮而起。甘心老是乡矣！故虽处忧患困穷，而志不屈。……于是几案罗列，枕席枕藉，意会心谋，目往神授，乐在声色犬马之上。”（《金石录·后序》）

易安所言，岂可以“痴迷”二字概之？此中有真意，欲道总难言。憾哉憾哉。

陆游诗曰：“浮生过六十，百念已颓然。独有枕书癖，犹同总角年。”

余仿其意亦得四句曰：“浮生近六十，七情已淡然。难易枕书癖，输与青少年。”

曾记 1989 年 10 月，五十而知天命之际，书有 12 字以自道自警：

淡泊 闲静 沉涵 养精 和气 敛神

汪曾祺说他小学上学途中，须经过大街小巷，放学回家常喜欢东看看，西看看，看各种店铺作坊，“这些店铺、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，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、笃实、轻甜、微苦的生活气息”。

我觉得加在“生活气息”前的四个词，极耐寻味。那样亲切，那么精当、妥帖，富有韵味；相信只有汪先生才能看得真，感得到，说得出。

陶杰在《大作家的情色执照》里说，大作家有情色自由，小作者创作却没有色情的权利。他举了日本小说家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《失乐园》的一段描写为例。该小说一出，港台评论家风靡地奉为极品，居然没有一个道学家大兴淫播褻的问罪之师。原来渡边淳一具有大学医科讲师的学术身份，中国读者对有学术成就的作家都额外地给予尊重，包括对《北回归线》的作者亨利·米勒或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的作者劳伦斯大表钦敬。

这是有道理的。比如有一些被认为不洁的词语，一般不宜写进作品，要写，也须换个较为婉转含蓄的代替之。然而在大人物的笔下，却无需禁忌，甚或还可谥为妙品，例如毛泽东词里的“不须放屁”，鲁迅之不避“性交”一词。不过，陶的说法似乎也有些片面，

对于情色的描写，成熟的读者仍然会有所鉴别，从中不难读出作者意图之严肃与否、感情之真纯与否，并不是都只见色而不鉴情。同样，用词雅俗之辨，也需要观其大旨，同时也不妨联系作者的性格趣味而作客观评价。

林纾送其第六子林珣折扇之背面，有示儿格言云：“沉默寡言，是卫生第一法。”

琴南老人所谓“卫生”，盖指养生，甚至是修身法。但老人一生似乎并不默寡，而谆谆告诫子弟，乃寓有其人生历练之深慨焉耳。

南帆想象自己是一条蚯蚓，从这本书拱入那本书，寻找书籍之间种种通道，直至发现了一个足以让自己思想栖居的空间。

这个比喻极好。打通了知识学问，方是思想产生之土壤。光说是博览群书，学富五车，也仍可能示人以硕大的书橱，门面风光而已。

沙汀说过：“找故事容易，找细节难。”

不错。读文章也是。看出内容易，发现细节难。语文教学须在文本细读上下功夫，本乎此。

叶圣陶在《谈文章的修改》里说：“写文章就是说话，也就是想心思。思想，语言，文字，三样其实是一样。”“学习写作不单是在空白的稿纸上涂上一些字句，重要的还在于学习思想。”

叶老在“三样其实是一样”中，强调的是思想，更准确地说，是“想”的重要性。只有想清楚，想通了，语言文字才得以赋形——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

舒乙回忆1964年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，其中包括人艺、青艺已不再找他写戏，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。访日归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，竟然寄出后石沉大海，客人少，说话少，产量下降，尤其是当时北京市已确定两个“拔白旗”的对象，一个是焦菊隐，另一个就是他，且已内定为北京市最大的“反动权威”。那一年住院，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。有一次文联组织人员深入基层搞创作，偏偏不理他。老舍回家后带着微笑，可是说得非常凄凉：“他们不晓得我有用，我是有用的。我会写单弦，快板，当天晚上就能排——你看我多有用啊……”

我读至此，录至此，已泪眼模糊，竟不能书。（2001年2月24日18时）

冯骥才在答记者问时谈到怎样理解“读书”，他说：“文学艺术与科学不同，科学在否定中发展，文学艺术在区别中存在。莎士比亚，托尔斯泰，我们谁也不能推翻他们，我们只能写他们没有写过的东西，用他们没有用过的方式。我们大量读书的目的，就是让这些名著，让这些先贤智者逼着我们去建立自己，发现自己。多看一部书，知道这个世界又被谁多占了一部分，我应该在哪儿立足。”

我认为这就是所谓完全主动的读书姿态，是把读书同样看作自己也投身进去的精神劳作，可以称为“贴紧的读”，是读你也读我，是千灯回照、物我交融。能够如此读书，收获必丰，尤其对于表达，必产生潜在的积极影响。

《文心雕龙》有这样几句话，可悟写作之繁简：“精论要语，极略之体；游心窜句，极繁之体。”游窜者，犹联想与想象也。不善此二者，则必流于繁冗芜杂，亦无体之可言。教中学生作文，可指导其适当写繁，令思维有所拓展，至于欲求精要，则非深思熟虑、文笔练达莫办，不宜强聒也。

孙绍振说：“想象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变异，也就是把表现对象变异为自己选择的意象。有了变异的意象才有可能寄托情感，并且加以美化的充分理由。”

是否可以这样说，不善于变异，就不可能想象？那么，变异又是靠的什么呢？变异也是可以训练的吗？

用极其简单的话，说极其复杂的理，人皆知极其不易。偶然见到适例，唯恐忘却，乃急索笔记之，例如——

◇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原罪精神：人本来是怎样的。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思想：人应该是怎样的。

◇ 过去的时代是有爱而不敢做，当今的时代是敢做而没有爱（贾平凹）。

孙绍振说：“作文本来是一种个体的文化行为，要求从个体本身出发，在张扬基本个性的前提下，帮助每个人认识这个世界和自我，尽可能地成为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资源和广阔精神自由的人，这才是我们的宗旨。”

这是强调作文与人的成长的关系。过去我们关注阅读对人的积极影响多，却甚少注意写作也可积累资源和丰富心灵。今天学校的作文教学，还只是处在学会表达的低级阶段，只有跨过了“怕写”的门槛，到达“乐写”的天地，始可与言文化资源与精神自由的话题。

英国19世纪大文人罗斯金在其名著《芝麻与百合》中说道：“一个人深有教养，并不一定懂得许多种语言，他也许只懂得本国语，只读过少数几本书。但是，但凡是他懂得的语言，他就懂得透彻；只要是他说得出的词儿，他就说得准确。总之，他掌握了这门语言的精髓。一目扫过，他就能辨别出种种词汇的差别，哪种具有真正来历和古代血统，哪种是现代俗物。”

我断不敢言已经掌握了汉语的精髓，但却大抵能够一目扫过，辨别出文字孰是高贵，孰是低俗。这大概就因为平时的读写，能自觉以准确透彻为自我期求。罗氏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解与表达的标杆性的要求，值得记取和践行。

雨果的小说《九三年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，其结论是：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原则。”

然而经历过长期“阶级分析”训练的大脑，将会立马作出反应：这绝对是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”，而且一定会被“绝对正确的革命”打倒在地下，再踩上一只脚。

有的话，由历史上某些政治人物说出来，可谓鞭辟入里。

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曾经写道：“宣传与真理绝对没有关系。”

据说林彪也说过：不说假话，不能成大事。

钱理群说：“真正的文学大师的语言，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，它有声，有色，有情感，有厚度、力度与质感，是应该细心地去体味、沉吟、把玩，并从中感受一种语言的趣味。”

这众多赞美的词语中，最值得细心体味的，是“质感”；最需要把玩出来的，是“趣味”。

可是，什么是“质感”？为何是“趣味”？意可会，言难传。

在《读书》杂志里读到一篇小文章，其中两段文字当即让自己联想到语文课程改革，

大有顿然憬悟之感，随手抄摘如下：

“多如牛毛的新理论、新见解，轻易的体系建造，除了表明社会浮躁心理外，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。”

“……在任何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体系内部必然存在革新与保守两种倾向，相反相成、并行不悖，共同构成社会体系稳定和发展的两翼。政治文化上革新倾向，在西方被称之为——自由主义，与之相对的是保守主义。社会也是个有机体，社会领域中的革新与保守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就功能而言，犹如生物学上的变异与遗传。……变革，是通过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使社会体系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；保守，是不断地向制度的本质复归，通过对固有价值肯定来巩固社会体系的稳定。变革和保守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是必需的，变革与保守之间并无优劣之分。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化中，乃至在语言中，保守都是一个贬义词，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。”

课改实施以来，不问历史上的母语教学有哪些固有价值需要肯定，而随便抓住些例子，不做具体分析，便从整体上对旧有的一套加以抹杀，力图重新建立全新的教学体系，也正反映了教育文化的幼稚不成熟，以及教育改革人士的浮躁心理。

当代的文风见诸遣词造句，行文谋篇，有太多的近似，甚或雷同。上个世纪的前 50 年间，文风不算鼎盛，但各具风格的作家，毕竟还数得些出来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尽了文体和语言创新的努力。周作人有一个意见，我认为很值得作家作为语言创造的追求，他在《燕知草·跋》和《苦竹杂记·后记》里曾谈过，要“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”并借杂糅口语、欧化语、古文、方言等，以造成“有雅致的俗语文章”。

上述一段话，会不会是夫子自道？或欲以自己的文章，替别人竖起标杆？

文洁若在《晚年的周作人》中写道：“八道湾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，……不论什么时候去，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。书桌上只摆着笔砚、稿纸和原著，此外，连张纸片都不见。多年后我曾问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妻子张茱芳，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拾一下。她说，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，书稿井井有条。工具书各有固定的地方，用毕必放回原处。她还告诉我，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十小时以上，而且都是自己研墨，毛笔正楷，从来不用钢笔。他不打底稿，改动很少，考虑好了再下笔。”

文化人的这种斯文洁癖，也跟传统基因的承续有关系，不是可以勉强学来的。

文洁若还说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的从 8 世纪到 18 世

纪的日本古典作品，以至 20 世纪的《石川啄木诗歌集》，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。“每一部作品，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，与原作不走样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，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。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。”

即便不是翻译，而是写作，“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”，也是何等的造诣！

1965 年 4 月 4 日，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说：“知海内报刊时常提及鄙人，无论是称赞或骂，都很可感，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。”

周作人所着意的，分明是人们是不是还记得他。

朱自清在《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》中，曾明确表示反对“将‘人的教育’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”，强调要注重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，由此来确定它在“人的教育”这一总目标中所应与所能担负的任务。

林炜彤说他 1987 年在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上曾经说过，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形势，还是处在宋公明二打祝家庄时期，虽闻千军万马厮杀之声，看见各具胜负的争战之状，但到头来并没能有效解决根本问题——为什么教、教什么、怎么教，最终还是走不出盘陀路。他希望有钟离老人能告诉老师，学生如何能走出盘陀路，指点红灯。

时过二分之一世纪，语文教学仍在盘陀路上转悠。四面八方，红灯高照，不是没有钟离老人，而是钟离老人太多，难辨是真真假。

个人最喜欢也最切记体认的一句话，是——

“文章做到极处，无有他奇，只是恰好；人品做到极处，无有他异，只是本然。”

有的道理，如何只一两句话即把本质说透，这在阅读分析，尤其在作文表达中要特别予以重视和加强训练。例如：

◇片面强调无私奉献，就等于将人置于价值真空之中。

◇教育行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其自身成为不必要。

◇潜规则，就是拿不到台面公开讲，但却实际存在的行为方式。